

世紀之交的東歐左派

• 金 雁

世紀之交的數年裏，東歐左派的分化、重組仍不斷出現新景觀。一些情況是劇變後第一個十年所未見過的。

一 新斯大林主義的興起

在一些國家，隨着轉軌期危機的延長，人民對「亂糟糟的民主」埋怨情緒上升，「魏瑪化」的社會心理使得當年的鐵腕人物重新成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隨着時間的流逝，劇變初期那種一面倒地詛咒舊體制的世情民意也不復存在，這使一些東歐國家出現了多年未見過的原教旨斯大林主義的抬頭。在那些長期陷於「魏瑪化」困境的地區（如俄羅斯），這種現象最為典型。復建後頭幾年俄共曾不斷表白反省歷史，許多人認為這意味着該黨在演變為「半社會黨」。但1996年後這種情況在俄共主流派那裏已經消失，「反省歷史」已經掉轉了方向，即變成反省以往如何不夠強硬和埋怨自己內

部出了放棄舊體制的「叛徒」。其中最極端者由否定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發展到否定赫魯曉夫 (Nikita Krushchev)，公開提出在立法上翻1956年的案，重新打出斯大林主義的旗號。如以俄共為主體的「共產黨聯盟—蘇共」在2001年7月分裂後，以舍寧 (Oleg Shenin) 為首的極左派召開「三十二大」，抨擊俄共走上「社會民主主義道路」，並決議廢除蘇共二十大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二十二大關於斯大林遺體搬出列寧墓的決議，否定赫魯曉夫改革，重樹斯大林旗幟。在俄共主流派召開的另一個「共產黨聯盟—蘇共」三十二大上也有人提出了類似的動議，久加諾夫 (Gennady Zyuganov) 等人以二十大決議「譴責的是個人崇拜本身，而不在於它與甚麼人有關」為理由沒有通過這個決議，但也提出了「必須在思想、組織與政治活動中恢復斯大林時代的優秀傳統」的主張^①。實際上，他採取的是「不給『個人迷信』平反，但給斯大林個人平反」的方針。

世紀之交的數年裏，東歐左派的分化、重組仍不斷出現新景觀。原教旨斯大林主義在抬頭，這種現象在那些長期陷於「魏瑪化」困境的地區最為典型。復建後頭幾年俄共曾不斷表白反省歷史，但1996年後「反省歷史」已經掉轉了方向，即變成反省以往如何不夠強硬和埋怨自己內部出了放棄舊體制的「叛徒」。

* 本文為作者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主辦的「冷戰後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學術研討會（北京，2002年1月25-27日）上宣讀的論文，現向會議主辦機構謹致謝意。

1993年興起的第一次「左派復興」被1997年前後的「東歐西行」中斷後，到了新千年前後第二次左派復興又再度形成氣候。這種狀況符合成熟的議會民主制下的「鐘擺政治」常規。但從細部觀察，與1997年的「西行」在多數國家都較劇變之初的「向右轉大潮」勢頭為小相對照，新千年之際的第二波「左派復興」卻比1993-97年的第一波更為明顯。

應當說，即使在俄羅斯左派中，這樣的典型斯大林主義也並未成為主流。但較傳統的、拒絕社會民主黨化的極左派，在世紀之交的不少東歐國家都取得了劇變以來從未有過的進展。在摩爾多瓦，沒有改名的共產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在捷克，捷克—摩拉維亞共產黨（捷摩共）在2000-2001年之交影響大為上升，一度直追自由主義的公民民主黨的第二大黨地位，這在前蘇聯以外的地區未改建為社會黨的傳統左派中是僅見的。此外，在一些國家，隨着社會黨執政的穩固與它的「中派化」，左右兩邊的反對黨勢力也在上升，而比它左的反對黨往往就是「傳統左派」。包括「新社會黨」在內的傳統一翼，如今也有發生與俄共類似（但程度不同）的「逆變」的例子，如保加利亞社會黨中的利洛夫（Alexander Lilov）一派。在「魏瑪化」危機嚴重的巴爾幹國家，出現這樣的現象是不足為怪的。

二 「新社會黨」的影響擴大

1993年興起的第一次「左派復興」被1997年前後的「東歐西行」中斷後，到了新千年前後第二次左派復興又再度形成氣候。這種狀況總的來講符合成熟的議會民主制下左右輪流坐莊的「鐘擺政治」常規，並不是甚麼驚人的變化。但從細部觀察，與1997年的「西行」（其實應當說是右派或中派復興）在多數國家都較劇變之初的「向右轉大潮」勢頭為小相對照，新千年之際的第二波「左派復興」卻比1993-97年的第一波更為明顯。例如：

在波蘭，布澤克（Jerzy Buzek）的第二次團派（由劇變前的團結工會陣營衍生的各種政治力量）政府不僅沒有1989-93年間那樣一種「白三角」（總統、

政府、議會均為團派控制）的聲勢，總統一職始終是左派的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在位，而且這屆團派政府矛盾多、政績差。它下台後，作為團派聯合組織的「團結工會選舉運動」基本已經解體，右派要再次崛起需經歷再組合過程。而第二次執政的民主左翼聯盟不僅復現了「紅三角」，議會中的優勢也比第一次大。克瓦希涅夫斯基第二次競選總統聯任的優勢也大於前一次，可以說波蘭的第二次左派復興基礎更穩。由於到這個時期轉軌進程的陣痛已經過去，它不需要出台多少得罪選民的「改革」措施，因而雖然不會超出議會政治「上台後聲望下行，下台後聲望上升」的規律，但聲望的下降程度會緩和得多，下屆連任也不是沒有可能。總之，波蘭在左右「輪流坐莊」的循環中，已顯示出社會民主主義的中長期優勢。

捷克在東歐第一波「左派復興」中是個未被波及的「右派孤島」，但到1998年，東歐執政最久的自由派政府捷克克勞斯（Vaclav Klaus）內閣終於下台，澤曼（Milos Zeman）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執政。這不僅開了捷克劇變後左派上台的先河，在整個東歐也是「老社會黨」（歷史上的、而非共產黨改建的社會黨）上台執政的首例。

在匈牙利，第一屆右派政府執政者公民論壇後來一蹶不振，第二屆右派政府執政聯盟為首的是自由主義的青年民主派盟，而匈牙利社會黨不僅在公民論壇下台後第一次執政，在本屆青民盟政府任期內，它作為在野黨的民意支持率也已超過執政黨而居首位。如無意外，下次大選可再次上台。因此，匈牙利雖然也是左右輪流坐莊，但左派政黨比較穩定，可以輪數次，而右派政黨則壽命不長，往往是下台後即發生組織解體，下次上台

已經是另一個右派黨了——但這往往需要右翼或中右翼力量的重新組合。顯然，從長期角度看這種狀況不利於右翼陣營政治資源的積累。

這種狀況可以說在東歐具有代表性，波蘭、羅馬尼亞、立陶宛等國都是如此。羅馬尼亞兩屆右派政府陣營迥異，而三屆左派政府都是伊利埃斯庫 (Ion Iliescu) 一派。甚至包括像俄羅斯這樣的左派至今未上台的國家，執政的右派或自由派也迭經重組，其主導力量從「民主俄羅斯」—「民主選擇」—「我們的家園」到如今的「團結黨」，一直沒有形成穩定的代表性組織。而左派始終以久加諾夫的俄共為主體。總之，無論總體的政治氣候向左還是向右，右翼政治組織的穩定性和政治資源的積累都較左翼遜色。筆者曾指出，這種「自由主義有生命力，自由黨無生命力」的現象也是發達國家常見的，不僅東歐為然。但在東歐，由於歷史文化的原因加上轉軌進程形成的路徑依賴，它對民主左派政治優勢的形成起着更明顯的作用。

新千年之際，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不僅在東歐大有起色，在過去一直形不成氣候的俄羅斯也打開了局面。俄共內部一方面出現前文所述的某些派別向原教旨斯大林主義發展，另一方面其他派別也向社會民主化演變。俄共主要理論家、政治局委員斯拉溫 (Boris Slaven) 退出俄共而加入社會民主黨、俄共內部以謝列茲尼奧夫 (Gennady Seleznyov) 為代表的「俄羅斯運動」體現出明顯的「修正主義」實即社會民主主義傾向，都是例子。而在俄共外，繼1991年的勞動人民社會黨、1995年的俄羅斯社會民主聯盟之後，俄羅斯眾多的社會民主主義組織最近又開始了新一輪統一的努力。2001年11月23日五個社會民主派組織

聯合成立了新的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戈爾巴喬夫擔任主席。這個黨如果最終能具有生命力，那將是俄羅斯產生東歐式「新社會黨」的開始。

在整個中東歐地區，「新社會黨」處境一般都比較好，處境最差的應屬前東德由統一社會黨改建的民主社會主義黨了。由於東德轉軌以「西併東」的兩德統一方式實現，民社黨受到西德政治模式移入的壓力，極難東山再起。但在世紀之交，即使是這個黨也取得了可觀的進展。1990、1994、1998年三次大選中，該黨在全德得票率從2.4%、4.4%升到5.1%，在1998年首次組成了議會黨團。而在前東德地區它的得票率更從11%、17%升到22%，使得一些地區的「舊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了地方選舉的需要不能不衝破本黨中央的禁令而與這個「前共產黨人」組織合作。由於歷史原因，這個黨不像多數東歐新社會黨那樣比社會黨主流更「右」，而是比老的德國社民黨更左一些。但這是按西歐標準，如果以俄共標準看，它已經是非常典型的社會黨了。

三 變淺的粉紅色

與上一點相應地，總的來講，東歐各國在未來一個時期內輪流坐莊的鐘擺政治進程中，民主左派或曰社會民主派會佔上風，這與當今西歐的「粉紅色歐洲」現象相似，實際上是歐洲政治一體化方向的體現。但作為政黨的社會民主派佔上風與社會民主主義佔上風並不是一回事。在當今的歐洲，自由黨無生命力而自由主義依靠右邊的保守黨與左邊的社會黨雙方的「自由化」來實現其持久優勢，已是歷史悠久的現象。如今西歐各國一方面是社會

新千年之際，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不僅在東歐大有起色，在過去一直形不成氣候的俄羅斯也打開了局面。在未來東歐各國輪流坐莊的鐘擺政治進程中，民主左派或曰社會民主派會佔上風，這與當今西歐的「粉紅色歐洲」現象相似，實際上是歐洲政治一體化方向的體現。

在第二波左派復興時期，促使社會黨繼續採取「超自由主義」政策的動力是一個新因素，即爭取加入歐盟的過程中與西歐討價還價的需要。東歐的廉價勞動力是其主要優勢，而西歐國家為了避免入盟後這些中東歐國家廉價商品的競爭，援用歐盟統一勞工政策與社會福利標準作為保護主義手段，就成了關鍵問題。

黨、工黨政治前途不錯，「粉紅色歐洲」可望持續；另一方面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以社會黨的自由主義化來實現，使「歐洲美國化、東歐西歐化、俄國東歐化」的趨勢也同樣明顯，歐洲的「粉紅色」正變得越來越淺。這一點在東歐也有突出表現。

世紀之交東歐各國社會黨、尤其是執政的「新社會黨」經過十餘年的恢復，在政治上已經羽翼豐滿，基本擺脫了「歷史包袱」，反映在黨派關係上已經不像90年代初那樣謹慎小心，到處求人合作，競選獲勝也得保持低調，有權單獨組閣也寧可爭取與別的黨聯合執政。如今這些黨在國內政治上已可以挺起腰桿說話，理直氣壯地當盟主；在對外事務中，也加入了社會黨國際，成為名正言順的「現代左派」，而得到了國際社會承認。但是在社會政策上，他們的傳統社會民主色彩仍然比一般西歐社會黨還要淡，「社會黨自由主義化」在東歐仍然比在西歐更明顯，尤其是處在執政地位後更是如此。波蘭、匈牙利的「新社會黨」上台後都比右派政府更積極地推行激進私有化、緊縮財政、削減福利。匈牙利社會黨政府改變右派政府保住能源、金融、交通等基礎產業國有成分的做法，實行「面向外資全賣光」，一年賣掉的國有資產比右派政府五年賣得都多^②。捷克克勞斯政府是東歐最有名的極端自由派政府，整天把「不帶任何限制詞的市場經濟」掛在嘴上，但實際上卻實行了高稅收、高福利、過度就業、保護企業避免破產的政策，號稱「右派福利國家」。而社會黨上台後福利大縮水，外資購買銀行等一系列禁區也放開了。為了進一步加快市場化改革，社會黨政府還與下了台的公民民主黨（即克勞斯一派）訂立「反對黨協議」，以社會黨推行自由經濟改革為條件換取後

者在議會的全面配合。實際上就是以「左派」向右轉來換取右派暫時放棄「反對黨」職能，兩家共唱雙簧，結果招來兩黨之外的其他議會小黨的抗議。

世紀之交這種狀況並未改變。但東歐各國社會黨政府這樣做的動機則有所不同。如果說第一次「左派復興」時社會黨主要是由於歷史包袱而刻意低姿態、爭取自由派的支持，同時也有「休克」時期財政困難無法維持社會保障的因素，那麼到第二波左派復興時期這兩個因素都已大為減弱：左派已不需要低姿態，國家財政也已改善。在這種條件下，促使社會黨繼續採取「超自由主義」政策的動力是一個新因素，即爭取加入歐盟的過程中與西歐討價還價的需要。在加入歐洲一體化市場時，東歐的廉價勞動力是其主要優勢，而西歐國家為了避免入盟後這些中東歐國家廉價商品的競爭，援用歐盟統一勞工政策與社會福利標準作為保護主義手段，就成了關鍵問題。於是出現了這樣的狀況：在歐盟傳統福利國家體制下連自由黨、保守黨人都不能放棄的福利標準，在中東歐卻顯得強人所難，東歐的左派政府不能不以發達條件不夠為由力爭降低福利門檻，以求入盟後保有一定的競爭力。這種「自由派要求福利國家，而社會黨要求自由放任」的狀況實際上是傳統左、右之分漸趨失靈的一個體現。

四 NGO反對WTO： 另類左派的興起

歐美地區近年來傳統左派包括社會黨、共產黨均呈衰落趨勢，而新興的左派：以後現代主義的各種批判理論、環保主義、和平主義、女權運動、文化多元主義與反全球化NGO運

動為內容的各種運動日趨活躍。尤其是1999年「西雅圖事件」以後，「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大景觀。世界各地不斷發生國際經濟會議遇到各國反全球化非政府組織聯合抗議的所謂「NGO反對WTO」事件。

世紀之交這樣的事也發生在東歐，這就是2000年9月2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捷克召開聯合年會期間發生的各國非政府組織大規模抗議示威。它成為繼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後捷克又一次吸引世界注目的大事，號稱「布拉格之秋」。在這個「布拉格之秋」運動中，各國抗議者一萬五千餘人包圍會場、堵塞道路，並與上萬名警察發生衝突，最後以會議提前一天草草收場告終。

這次運動的主力實際上是來自意大利、奧地利等西歐國家的反全球化新左派組織。捷克公民並非運動的主力。但在捷克內部，各種「左派」對此事態的態度大相逕庭。當時執政的社民黨澤曼政府作為會議的東道主堅決反對「布拉格之秋」，與著名自由知識份子出身的哈維爾 (Václav Havel) 總統及公民民主黨控制的議會態度一致，受社會黨控制的捷克最大工會組織CMKOS也拒絕參與此次抗議行動。但托派的「捷克社會主義工人組織」、「社會主義團結」運動與無政府工聯主義團體「團結」則積極參加了抗議。而此次抗議的捷克發起人則是由無政府主義者與生態環保人士組成的「自主反對經濟全球化」組織 (INPEG) 與獨立工會聯合會ASO。捷摩共也支持此次活動，並通過其控制的規模不大的極左工會OSCMS與青年團KSM提出了合作的要求。然而INPEG與ASO均表示拒絕與「斯大林主義餘孽」捷摩共及其附屬組織合作，與此同時，他們都表示願意與托派聯手發動這次鬥爭^③。

最終，「布拉格之秋」在捷國內成為托派、無政府主義者、環保人士、部分工會與反全球化NGO的一場運動。這次「廣場狂歡」式的運動連同在西雅圖、熱那亞、巴塞羅那等世界各地的反WTO示威一起標誌着全球化時代一種不同於傳統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另類運動的興起及進入東歐。這場運動儘管打着「非政府組織」的旗號而不願自稱為左派，但作為反對所謂「跨國公司與全球壟斷資本主義」、反對「市場全球化」的運動，它事實上是一種新型左派。「布拉格之秋」顯示出它在中東歐地區具有發展前景，尤其是在入盟談判中，東歐各國已經感受到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挑戰，這類左派目前還形不成甚麼大氣候，但在今後的中東歐國家會有可觀的發展空間。當今的中東歐，沙夫 (Adam Schaff) 式的「新社會主義」是一種「沒有運動的思想」，而實力強大卻日益失去自己意識形態特徵的社會黨也逐漸變成「沒有思想的運動」。而「布拉格之秋」這種以後現代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為背景的反全球化NGO聯合行動，卻有可能發展為既有「思想」、又有「運動」的政治現象。人們對此應當有所關注。

1999年「西雅圖事件」以後，「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大景觀。200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捷克召開聯合年會期間發生的非政府組織大規模示威，號稱「布拉格之秋」，標誌着全球化時代一種不同於傳統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另類運動的興起及進入東歐。

註釋

- ① 《真理報》，2001年10月30-31日。
- ② 參見金雁、秦暉：〈匈牙利轉軌中的激進與保守〉，《改革內參》，2001年第10期。
- ③ 《工人權利報》(捷)，2000年9月號。

金雁 1954年生，山東定陶人，筆名蘇文。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東歐處處長、研究員，主要從事東歐、俄羅斯的歷史與現狀研究。